

三聯人文書系

陳平原 主編

蒲慕州 著

歷史與宗教之間



ISBN 978-962-04-3881-3



聯合出版集團



起閱網
SuperBookly.com



更多好書請訪問三聯網頁：
<http://www.yantpublishing.com>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HK\$ 98.00

陳平原 主編

三聯人文書系

蒲慕州 著

歷史與宗教之間



三聯人文書系

主 編 陳平原

責任編輯 李 斌

書籍設計 吳冠曼

書 名

歷史與宗教之間

著 者

蒲慕州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九九號北角工業大廈二十樓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三樓

陽光（彩美）印刷公司

香港柴灣祥利街七號十一樓B十五室

二〇一六年一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大三十二開 (141×210 mm) 三六〇面

ISBN 978-962-04-3881-3

© 2016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香港發行

印 刷

版 次

規 格

國際書號

總序

陳平原

老北大有門課程，專教「學術文」。在設計者心目中，同屬文章，可以是天馬行空的「文藝文」，也可以是步步為營的「學術文」，各有其規矩，也各有其韻味。所有的「滿腹經綸」，一旦落在紙上，就可能或已經是「另一種文章」了。記得章學誠說過：「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我略加發揮：不僅「良史」，所有治人文學的，大概都應該工於文。

我想像中的人文學，必須是學問中有「人」——喜怒哀樂，感慨情懷，以及特定時刻的個人心境等，都制約著我們對課題的選擇以及研究的推進；另外，學問中還要有「文」——起碼是努力超越世人所理解的「學問」與「文章」之間的巨大鴻溝。胡適曾提及清人崔述讀書從韓柳文入手，最後成為一代學者；而歷史學家錢穆，早年也花了很大功夫學習韓愈文章。有此「童子功」的學者，對歷史資料的解讀會別有會心，更不要說對自己文章的刻意經營了。當然，學問千差萬別，文章更是無一定之規，今人著述，盡可別立新宗，不見得非追韓摹柳

不可。

錢穆曾提醒學生余英時：「鄙意論學文字極宜著意修飾。」我相信，此乃老一輩學者的共同追求。不僅思慮「說什麼」，還在斟酌「怎麼說」，故其著書立說，「學問」之外，還有「文章」。當然，這裏所說的「文章」，並非滿紙「落霞秋水」，而是追求佈局合理、筆墨簡潔，論證嚴密；行有餘力，方才不動聲色地來點「高難度動作表演」。

與當今中國學界之極力推崇「專著」不同，我欣賞精彩的單篇論文；就連自家買書，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專題文集，而不是疊床架屋的高頭講章。前年撰一《懷念「小書」》的短文，提及「現在的學術書，之所以越寫越厚，有的是專業論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眾多陳陳相因的史料或套語來充數」。外行人以為，書寫得那麼厚，必定是下了很大功夫。其實，有時並非功夫深，而是不夠自信，不敢單刀赴會，什麼都來一點，以示全面；如此不分青紅皂白，眉毛鬍子一把抓，才把書弄得那麼臃腫。只是風氣已然形成，身為專家學者，沒有四五十萬字，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

類似的抱怨，我在好多場合及文章中提及，也招來一些掌聲或譏諷。那天港島聚會，跟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陳翠玲偶然談起，沒想到她當場拍板，要求我「坐而言，起而行」，替他們主編一套「小而可貴」的叢書。為何對方反應如此神速？原來香港三聯書店向有出版大

師、名家「小作」的傳統，他們現正想為書店創立六十週年再籌劃一套此類叢書，而我竟自己撞到檯口上來了。

記得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九三二年出版，也就五萬字左右，錢鍾書對周書有所批評，但還是承認：「這是一本小而可貴的書，正如一切的好書一樣，它不僅給讀者以有系統的事實，而且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思。」稱周書「有系統」，實在有點勉強；但要說引起「許多反思」，那倒是真的——時至今日，此書還在被人閱讀、批評、引證。像這樣「小而可貴」、「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思」的書，現在越來越少。既然如此，何不嘗試一下？

早年醉心散文，後以民間文學研究著稱的鍾敬文，晚年有一妙語：「我從十二三歲起就亂寫文章，今年快百歲了，寫了一輩子，到現在你問我有幾篇可以算作論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如此自嘲，是在提醒那些在「量化指標」驅趕下拚命趕工的現代學者，悠著點，慢工方能出細活。我則從另一個角度解讀：或許，對於一個成熟的學者來說，三五篇代表性論文，確能體現其學術上的志趣與風貌；而對於讀者來說，經由十萬字左右的文章，進入某一專業課題，看高手如何「翻雲覆雨」，也是一種樂趣。

與其興師動眾，組一個龐大的編委會，經由一番認真的提名與票選，得到一張左右支絀的「英雄譜」，還不如老老實實承認，這既非學術史，也不是排行榜，只是一個興趣廣泛的

讀書人，以他的眼光、趣味與人脈，勾勒出來的「當代中國人文學」的某一側影。若天遂人願，舊雨新知不斷加盟，衣食父母繼續捧場，叢書能延續較長一段時間，我相信，這一「圖景」會日漸完善的。

最後，有三點技術性的說明：第一，作者不限東西南北，只求以漢語寫作；第二，學科不論古今中外，目前僅限於人文學；第三，不敢有年齡歧視，但以中年為主——考慮到中國大陸的歷史原因，選擇改革開放後進入大學或研究院者。這三點，也是為了配合出版機構的宏願。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日

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

目錄

自序	001
神仙與高僧——魏晉南北朝宗教心態試探	003
漢代薄葬論的歷史背景及其意義	055
睡虎地秦簡《日書》的世界	137
中國古代鬼論述的形成（先秦至漢代）	233
先秦兩漢的尊古思維與政治權威	265
循理以明情——中國宗教研究管窺	325
作者簡介	350
著述年表	351

自序

收集在這本小書中的一些文章，都是曾經在不同期刊及書籍中發表過的，承蒙香港三聯書店的邀請及支持，現在能集成一冊，方便讀者，實在令人感激。對個人而言，現在回顧過去的作品，卻有些陌生之感。為什麼？也許如同個人的記憶一樣，在一段時間中的經歷、想法，事過境遷之後，就被推到記憶深處，甚至不再留存在腦海中，直到其他的機緣重新勾起。但這情況也許有其他的說法：一個作者，就說歷史學家吧，當他發現自己其實不記得曾經有過的想法，不記得曾經討論過的問題，那麼那些想法和問題還能算是他的嗎？換個角度看，他之所以不記得自己想過或者說過什麼話，是否表示那些話其實不是他真正的主意，或許是他道聽途說，或者接受了別人的想法，不是自己的原創？這些情況也許都有部分是事實。想到這裏，不禁覺得有些喪氣。但，人的思想有多少是真正的原創？我們不都是接受別人的想法刺激之後，才能發展出一些自以為獨特的看法？或者，如果再換個角度，把這本小書當作史料，是否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呢？

我假設有興趣翻閱本書的讀者大概對歷史會有些興趣和了解，那麼就把本書當作史料來

看吧。歷史學家對於搜集史料，一般都希望了解那材料是誰留下的，在什麼樣的環境之下留下，又是為了何種目的而留下？有了這些了解，史家才能比較有把握做進一步的分析。除了檢討材料的真實性，也要討論材料的限制，它能告訴我們什麼，又不能告訴我們什麼。這本小書中的文章，寫於不同的時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個人在不同時間的關切重心。顯然這些問題與許多其他的歷史問題一樣，很難有什麼最終的答案。因而這些文章的作用可能只是呈現了一些問題，提供了一些看法。它們反映了作者一時一地的思緒，有其在知識和理論上的限制。對於個人而言，它們是個人學思歷程的記錄；對於所謂學界而言，它們可能是一個世代中學術潮流的一些具體反映。至於反映出什麼樣的潮流，讀者可能會有各自的看法，我就不必在這裏多說了。至於寫作的環境，就我的經歷而言，應該算是有很大的自主性的，沒有人或機構指定我做什麼研究，或者限制我的表達，可說相當自由而幸運。也因為如此，作品的一切不足和錯誤也就沒有什麼藉口可卸責。收集在此的文章，除了極少數錯字更正之外，一仍舊貌，以示存真，尚望讀者諸君有以教之。

神仙與高僧

——
魏晉南北朝宗教心態試探

一、引論：宗教心態的探索——以神仙與高僧為例

（一）宗教心態

本研究之目的在藉神仙與高僧兩類人物來探討魏晉南北朝時代一般人之宗教心態。何謂「宗教心態」？宗教心態與宗教信仰不同。宗教信仰，一般指的是人們的思想或習俗中，對於超自然力量與人之間的關係所形成的某種認識和解釋。討論宗教信仰，主要注意的是人們所持的信仰內容，包括教義、儀式，以及其起源、流變等問題。而所謂的「宗教心態」，指的是人之所以會持有某種信仰的心理因素，和一些默然存在，但並不在信仰中凸顯出來，不一定為信仰者自己所感覺到，也不一定有任何系統的習慣和傳統。這些心理因素與習慣和傳統是影響人們之所以會接受某種宗教的原動力，是一種宗教信仰生長的精神土地。討論「宗教心態」，目的在於更進一步的探索一個社會的文化性質。我們不但要了解人們具有何種宗教信仰，還要了解這種信仰所根據的心態。〔一〕

宗教信仰的形成有其歷史因素，這歷史因素包括了一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思想等各方面的情況。用實際的例子來說，一般討論漢魏之際宗教情況的學者多會注意到二類歷史

因素：一為政治秩序混亂所造成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包括各種天災人禍；一是居統率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式微和道、法、名家等各種思潮的興起。這些因素在民間造成了老百姓追求解脫世間苦痛的需要，在知識分子間則激起了追求解脫思想苦悶和懷疑的風尚。^{【一】}而論佛教能傳入中國的原因，也常以為是由於初期佛教教義在智識方面援引中國固有，尤其是道家的一些概念和語彙，使得中國士人較容易接受；而在情感方面則說人世之苦空而助一般人化解生活中的苦痛。^{【二】}那麼這種對解脫世間苦難以及思想苦悶的追求是否就是「宗教心態」的一部分？這些因素的確可以被認為是宗教心態的一部分，但是並非全部。人世之間的戰亂、天災，導致社會秩序的破壞及改變，的確常常是導致人們向宗教求助的因素，如希臘化時代救贖性宗教的興起，就有學者解釋，是由於當時地中海區社會秩序紛亂，城邦生活瓦解，大領

【一】有關宗教心態的意義的討論，可參見 Aron Gurwicz, *Medieval Popular Culture: Problems of Belief and Percep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xii-xx。

【二】參見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〇年），頁二〇五—二一九；E. Balazs, "Nihilistic Revolt or Mystical Escapism",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226-254。

【三】有關的論述極多，參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頁一八八；任繼愈編：《中國佛教史》（台北：谷風出版社重排印，一九八七年），卷一，頁一〇〇。

土國家出現，於是與城邦生活密切結合的舊宗教信仰也就失去重心，不能對一般人精神的空虛有所助益，再加上百姓生活的困苦，貧富之間差距的增大，這些都是促使新宗教興起的原
因。【一】

不過，很顯然的，希臘化時代之前的古典希臘時代也有豐富的宗教信仰和活動。所以人類社會對於宗教的需求，也不一定是由於有特別的天災人禍才會出現。任何一個正常發展的社會，其中所有的生老病死等問題，已經足以提供宗教發展所需的環境，因而在分析一個戰亂時代（如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宗教發展時，我們固然要注意外在的社會環境的變動所可能帶來的影響，也不能忽略了社會本身的正常潛力。因為，若強調社會動亂為人心思解脫而求助於宗教的原因，就不能理解在一個「平常」的社會中宗教如何能出現，而又如何能繼續下去。基於這樣的了解，我們在討論此一時代的宗教心態時也應該設法觀察能影響一般人宗教信仰的「平常因素」。

在此我們必須釐清的是，所謂的「一般人」指的是哪些人？目前我的興趣是以非知識分子為主，但是這並不是說非知識分子的宗教心態和知識分子絕不相同。研究心態史和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學者早已指出，一個文化中的精英（elite）部分和所謂的通俗部分有相重之處，並且能夠相互影響。而通俗文化的主體雖以非知識分子為主，其中也包括了社會

中的上層階級，蓋因所謂的「上層階級」並不一定為智識活動的參與者，反而可能是通俗文化的支持者。^{【一】}這一點，在秦漢時代的中國的例子有如秦皇漢武的求長生不死藥，以及貴族墓葬中的各種與民間信仰有關的隨葬品或裝飾（如銅鏡、搖錢樹、畫像等）。這些對不死和鬼神精怪的信仰，顯然不屬於所謂儒家大傳統的範圍之內，然而卻廣泛地流行在當時的上層社會之中。在魏晉南北朝時代，文化精英分子的思想，不論是固守儒家傳統的保守分子，或者以老莊佛道為追求目標的激進分子，^{【二】}都留下了不少的文獻材料可資研究。但是此時屬於非知識階層的人們的情況如何？他們在接受佛教或道教時，所根據的基本宗教心態是什麼？這方面的材料就不多了。也許就是因為如此，這些問題以往學者不甚留意。這正是本文想要努力的。因為，不論是研究道教史或佛教史，若在研究了其表象之後（教義、儀式等），來與這宗教心態相印證，應能得到一種比較完整的對當時人宗教生活的了解。

【一】參見 E. C. Grant ed., *Hellenistic Religions*, (N.Y., Bobbs-Merrill, 1953), pp. xx-xxxix; A. D. Nock, *Conversion — The Old and the New in Religion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Augustine of Hipp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pp. 1-16; E. Peters, *The Harvest of Hellenis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0), pp. 446-479。

【二】參見 P. Burke,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N.Y., Harper & Row, 1978), pp. 23ff。

【三】參見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台北：廬山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頁一三一。

(二) 材料的選擇

要討論一般人的宗教心態，首先遇到的就是材料問題。如同所有討論通俗文化——尤其是中古以前的——古代的情況一樣，由於討論的對象本身很少留下表達其自己的觀念的文獻，研究者就必須利用一些間接的材料，如考古文物，或者一些由知識分子所寫的但可以反映出一般大眾的思想的文獻。^[2]討論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通俗宗教心態，可以利用的主要也不外乎間接材料。本文現在所嘗試用的是《神仙傳》和《高僧傳》兩部書。之所以選這兩部書，並非認為它們足以完全代表此一時代的通俗宗教心態。實際上，這兩部書應該算是道教和佛教思想史上重要的典籍。不過，正由於它們是道佛兩教的要籍，而神仙和高僧兩類人物又是一般信奉道教和佛教的人們的景仰的對象，因此，我們應該能夠從這兩類人物的身上找到某些特質，可以反映出當時人之所以為道教或佛教吸引的原因，再進而比較神仙與高僧的這些特質，來推論一般人的宗教心態。顯然，利用這種材料所做的討論，其涵蓋面是有限的。但即使是以有限的情況而言，仍然值得做一個初步的嘗試，其目的主要在於提出一個研究的方向，並且看看是否能表現出至少是一部分人的宗教心態。

如果此種探討方式能夠成立並且得到一些成果，以後就應該擴大討論的範圍，進一步使用其他的相關材料，如正史、魏晉時代的誌怪小說、詩文、碑傳、佛道典籍、地理書（《水